

鼎石山下 运河情

□ 徐苏

运河边上的鼎石山，顶端有一高高的僧伽塔，可视作这段运河的标志性建筑。不过，宝塔最先的落脚之地不是鼎石山，而是相邻不远的寿邱山。传说僧伽塔和寿邱山上的普照寺有着密切关系。过去在泗州有一座僧伽塔，到宋绍兴年间时，泗州僧人因避战乱，就奉僧伽像来到了镇江普照寺，普照寺的方丈接待了他们，并仿照泗州建了一座僧伽塔，用来供奉僧伽像。

宋代的僧伽塔是什么模样，又是何种结构，已说不清了。现在我们看到的鼎石山僧伽塔是一座砖塔，建于明代万历年间，塔高约32米，呈八角形状，黄色的墙，葫芦般色彩的顶，总共为七层。塔的每层有四个门，交错而开。塔的四周边建有石栏。塔前有山门，立“古僧伽塔”石额。

镇江的方志中，记载过一段故事，说是万历年间，当地有一个叫张凤翼的读书人，相信风水先生的话，认为寿邱山上的僧伽塔不吉利，妨碍了镇江读书人考科举，就自己掏钱把塔移建到了鼎石山上。后来张凤翼还因为移塔之事没有得到官府的认可，得罪了县太爷，被抓进了大狱。若不是碰上镇江的读书人纷纷出来在巡按御史面前为他辩解，打抱不平，险些酿成历史上的一桩冤案。

不知是否巧合，塔移后的镇江科考倒也争气，考出了不少进士。尤其是运河边南大街的张九徵家，先后考出了六个进士。顺治二年(1645年)张九徵参加清江南开科乡试，夺得解元。两年后他赴京参加会试，考中进士。官至河南提学学事，视察河南学政。他的长子张玉裁以进士一甲第二人(榜眼)的身份授翰林院编修。次子张玉书是顺治朝进士，官至刑部尚书、文华殿大学士、户部尚书，有“太平宰相”之誉。四子张仕可、五子张恕可都考中康熙朝进士。张玉书的长子张逸少也是康熙朝进士。

僧伽塔是一个值得流连的地方。它不仅造型别致，也是观赏风景的佳处。明代诗人于孔谦的《登鼎石山塔》诗中说：“轻舟访旧过三山，夜泊关南江水流。一塔凌空压万派，九重高阜似连环。疎身直跨烟云上，豁目横波海日间。逐客不堪临北望，踰征恩诏可能颁。”诗人从塔上远眺，江天之胜，山水之奇，尽收眼底。那人云的奇峰，山脚的清流，城中交错的楼宇，隐约的庭院，山间腾起的烟雾，皆和谐成趣，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。

清代诗人汪琬的《鼎石山野眺》诗，也赞美了这里的景色：“城南依孤棹，极目但苍苍。白马吴门回，青山楚塞长。桃花临断岸，兰若出斜阳。惟羨东流水，潺湲到故乡。”

鼎石山下热闹的时候居多，因为靠近河边上有一个出名的都天庙。有个叫龚自珍的清代文人，在路过此地上岸时，正赶上都天庙会，那里人山人海，香火极盛的现象，引起了他的感慨。此时，有道观的一位老道长请他作一首青词，于是他有感而发，写下了“九州生气恃风雷，万马齐喑究可哀。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”的千古名言。他巧借题咏的手法抨击了时弊，述说了自己渴求变革的心情，发出了历史的强音。

鼎石山脚下的码头，曾是运河古道上最繁忙的地方。这里商家客户云集，凭借都天庙会之机，成了镇江最兴旺的商贸场所。那时的都天庙会，是大江南北的一次盛会，其影响力远超过镇江的地界，吸引了周边不少地区的商家和游客关注。每到庙会，不仅镇江的男女老少要到庙里去拜神上香，外地专程来镇的人也很多，城里的大小旅馆床位难求，大小船只布满了码头边的运河沿线。都天庙会的大游行队伍也很壮观，长达十里，城里的各行各业都派人参加，从当天拂晓开始，就在镇江城里城外的主要马路上游行。游行队伍经过的主要路口，还有各行会按照事前的分工，再打出各自的招牌产品，加油助威，显得异常热闹。许多商人借机和各行各业的老板见面，洽谈业务，寻找商机，起到了庙会搭台，商贸唱戏的效果。会期中，镇江的流动人口要比平时多出十多万，商贸营业额也直线上升，体现出镇江经济对周边地区的强劲辐射力。

如今随着运河功能的变化，鼎石山下的古运河已不再是航运的通道，逐渐演变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。这里的河道经过治理，水清了，柳绿了，花开了，河边建起了亭阁，修通了路径，添加了彩灯，和花园城市的节拍协调起来。鼎石山延续了古朴的风貌，假山清池、亭台楼阁、曲径小道、山木绿荫，又建起了中日友谊梅樱园，增添了花的色彩。每到花开季节，樱花盛开，满园春色，赏樱成了游人的一大乐事。

而沉默多年的都天庙经过修缮，也逐渐恢复了生气。“都天庙”老牌匾的碑体墨迹，老屋砖瓦呈现出的黛青色，庙宇屋脊上的龙头装饰，仍在无声地述说这座古庙的悠久，让人联想起那“都天会”的点点滴滴。



谭震林，无产阶级革命家，苏南抗日根据地创建者之一。抗战时期，从1940年春奉命前来苏南东路主持党政军工作，到1942年5月调任新四军军部离开苏南，期间他曾三次来到镇江，留下许多令人津津乐道的逸事。

一到镇江：“谭老板”的称呼始于延陵

1940年3月，中共中央东南局、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决定将谭震林从皖南前线调往苏南东路地区，以加强东路的领导力量。

谭震林率领数十名随行干部及人员，从新四军军部驻地泾县云岭出发，通过敌人的数道封锁线，抵达溧水西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，受到陈毅司令员的欢迎。随后，陈毅派部队专程护送谭震林一行，在茅山根据地沿途各地党组织的协助下，顺利到达丹阳延陵庄湖村。

此时，日伪强化对京(宁)沪铁路沿线的封锁，在铁路两侧架起电网，运河所有船只夜间一律不予放行，特别是对茅山通往苏南东路的交通要道丹阳陵口控制极严。由于缺乏破坏电网的常识和经验，丹阳地方党组织和游击武装多次组织侦察，仍然找不出能够安全通过的办法。

谭震林决定分两路向苏南东路的常熟游击根据地进发。他亲自带领几名团营干部为一路，由延陵经水路去常州，再改乘火车抵苏州，之后再转往常熟。为了确保途中安全，谭震林借用延陵镇一家绸布店老板



新四军苦练杀敌本领

李明的姓名，搞了张“良民证”，并脱下旧军装，换上雪白衬衣，毛料背带西裤，外穿喇叭衫，头顶黑色礼帽，俨然一副大老板派头。随行众人打扮成伙计、学徒的模样，对谭震林以“老板”相称。以至于到了东路不久，军中即流传“上级派来了个老板！”由此，“谭老板”的称呼渐渐传开，毛泽东闻之亦唤其为“谭老板”。

二到镇江：登圆山“小县长”调侃“老革命”

1941年7月，日伪对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发动清乡。8月下旬，谭震林率主力部队突破敌人的包围圈，转入澄西地区。当时丹北的段家桥是中共(京沪)路北特委驻地，谭震林在段家桥召开县以上党政干部会议，对苏南西路特别是丹北地区的反清乡斗争作出部署。

会后，谭震林找到山北县(镇江)县长赵文豹，笑盈盈地问道：“圆山这一带地形你不熟？”见首长这么平易近人，赵文豹也毫无拘束地回答：“我家就在圆山脚下，生在圆山，长在圆山，圆山的七十二个洞我闭着眼睛都不会跑错。”谭震林听了高兴地说：“好，你带路，上山去看看。”

谭震林、赵文豹一行10余人从圆山南边上山，经东霞寺到达半山庙。谭震林在庙中小憩片刻，并饶有兴趣地询问庙名的来历。那天谭震林穿的是皮底布鞋，脚下容易打滑，爬山时就显得有些吃力，于是赵文豹拿他打起了趣：“你不是老游击队员吗？爬山

抗战时期谭震林三到镇江

□ 孟宪威



谭震林

的本领怎么倒忘记了？”

此时的赵文豹年方21岁，被谭震林戏称为“小县长”。而谭震林则年近四旬，曾跟随毛泽东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，是标准的“老革命”。而赵文豹敢调侃谭震林，一是他正处于初生牛犊的年纪，说话少有顾忌；二是他性格比较“虎”，在对敌斗争中以坚决、勇猛的作风而闻名；三也说明当时党内的民主氛围和平等的同志关系。

登上圆山山顶，谭震林又腰仁立，极目远眺。长江如一条玉带蜿蜒伸展，荷花池、扬中、和尚洲(今江心洲)恰似三块碧绿的翡翠镶嵌其中，谭震林赞道：“好地方！好地方！真是天堑长江！”并询问起三江营、抗英炮台及大江南北交通等情况。听完赵文豹的详细汇报，谭震林凝望长江，沉思良久，缓

面通过，穿着普通、神色自若的他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。陈小毛则闪身躲进路旁一户老百姓家中，当时正是晚饭时间，他进去把担子一放，拿起碗来就和老百姓一起吃饭，伪军以为他是这家的人，于是没有理会。而走在最后的张坚却被伪军扣住盘问。

谭震林与陈小毛脱险会后走了半夜，在一个村边休息到天明，又找了一个上午，才在丹阳延陵岗下村找到丹阳县委。张坚也很快安全归来。原来他被伪军扣下后，机智地把身上携带的钞票掏出来抛撒，伪军一见这么多票子，立即互相争抢，乱作一团，于是张坚借机脱身跑掉了。

到达茅山后，谭震林自兼第十六旅旅长，整训部队，提高战斗力。发展地方武装，对地方党政工作进行检查指导。从苏南东路、浙西调来一批领导骨干，充实到各级党政机关。加强地方财政和部队的军工、医疗工作。在他亲自坐镇与主持下，苏南抗日斗争形势得到稳定、扭转与发展。

调任军部：从高资渡江北上

1942年5月，谭震林奉命调往盐城新四军军部工作。前往淮南抗日根据地参观学习茅山地委副书记汪大铭等5名干部与他顺道同行。

5月15日傍晚，谭震林一行从丹阳延陵附近的驻地出发，经过两个晚上的秘密行军，到达镇江，句容交界处的裔庄，这里距高资镇和长江边只有10多公里。谭震林决定在这里隐蔽待机，从高资附近偷渡长江。

经组织安排，高资老船工张福礼领受了送谭震林等人过江的任务。张福礼当时60多岁，他胆大心细、机敏过人，几十年的渔家生涯，练就一身过硬的弄船本领，曾多次为新四军运送粮食、武器，是高资秘密交通线上最可信的船工。

从高资至入江的马桥口，约有7公里的内河航线和两个敌人哨卡，一是高资铁路桥哨卡，二是马桥口哨卡。任务重大，为确保万无一失，张福礼用三天三夜的时间反复进行试航，基本掌握了日伪军巡逻的规律，确定了靠芦苇滩航行的路线，一旦遇到敌情，可以随时进入比人高的芦苇丛中与敌人周旋。

5月25日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张福礼带着堂兄弟张福芝、张福堂，将渔船按时停靠在小唐湾庄码头。黄昏时分，谭震林及全体渡江人员上船，隐蔽在船舱内，只留汪大铭和张福礼兄弟在甲板上摇橹。快到马桥口时，意外情况发生了，只见河道上停满了大小船只，难以通行。敌人哨卡近在咫尺，多耽搁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。汪大铭找到对方的船老大，暗中表明新四军身份，船老大欣然帮忙疏开一条航道，使张福礼的渔船快速进入长江，脱离险境。

从马桥口到长江北岸的仪征有20公里的水路，都是逆风逆水，有些颠簸，谭震林一不小心，还把心爱的加拿大手枪掉进了江里。天又下起了大雨，行船更加困难。张福礼三兄弟团结协作，轮流摇橹，顶风破浪、冒雨航行。不久风向转了，张福礼吩咐赶快升帆，这样行船得快多了。经过整整一夜与风浪的搏击，渔船终于安全抵达仪征大河口。从此，谭震林告别整整战斗了两年的苏南大地，踏上新的征途。

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

宋朝的足球

□ 马庆民

国际足联实名认证过，足球起源于我国的齐鲁大地，那时叫蹴鞠，春秋战国时期已广为流行。

到了唐朝，人们开始用空心球，往球内充气，竞技水平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，《资治通鉴》等正史上，记载过吐蕃与大唐球队的友谊赛。但真正让中国足球步入黄金时代、达到世界巅峰的，却是宋朝。

很多人对大宋足球的印象，源于《水浒传》里的高俅。书中是这么写的：“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，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，姓高，排行第二，自小不成家业，只好刺枪使棒，最是踢得好脚气毬。京师人口顺，不叫高二，却都叫他做高毬。后来发迹，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，添作立人，便改作姓高名俅。这人吹弹歌舞，刺枪使棒，相扑顽耍，颇能诗书词赋；若论仁义礼智，信行忠良，却是不会，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。”

其实在宋朝，踢球并非元末明初人施耐庵理解的游手好闲之徒玩的雕虫小技，而是风靡大宋三百年的国技。那时，蹴鞠是全民狂热的运动，从平民到高官，没有不爱蹴鞠的。哪怕是宋朝的皇帝们，如赵光义、赵匡胤、赵佶，简直是蹴鞠运动最大牌的代言人和推广人。宋太祖赵匡胤是个疯狂的“球迷”，不光爱看球，踢球技术也相当了得。他尤其擅长“白打”，也就是现在人们口中的“花式足球”。故宫有幅元朝画家钱选临摹北宋苏轼的《宋太祖蹴鞠图》，画面上全神贯注踢球的六个人，组成了世界足球史上最豪华的出场阵容：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，他的弟弟、大宋第二任皇帝赵光义，宰相赵普，开国功臣楚昭辅，大将钱进和石守信。

“太祖蹴鞠”的故事还被写成了推动足球运动的广告词：“巧匠圆缝异花样，身轻体健实堪夸。能令公子精神爽，善诱王孙礼义加。宜富贵，逞奢华。一团和气遍天涯。宋祖昔日皆曾习，占断风流第一家。”

除了皇帝，宋朝士大夫中也不乏踢球高手，如宰相丁谓、李邦彦，球艺都十分了得。在《宋朝事实类苑》中：“国朝士人柳三复最能之，丁晋公亦好焉……，初柳为进士，欲见晋公由，会晋公蹇后，柳往伺之，球果并出，柳即取。左右以告，晋公亦素闻柳名。即召之，柳自怀所素业，首戴毬以入，见晋公再拜者三，出怀中书，又再拜，每拜辄转至背方向背既起复在头上，晋公大奇之，留为门客。”讲的是这个叫柳三复的士人，踢球也很厉害，被同样是高手的领导(丁谓)赏识的故事。

有狂热球迷和业余高手皇帝，士大夫加持，宋朝足球不但起步之高，而且还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俱乐部：齐云社。宋人撰《蹴鞠谱》开篇即说：“蹴鞠初兴黄帝为，王孙公子可相宜。世间子弟千般戏，惟有齐云实可奇。”可见当时的齐云社堪称宋朝的“皇马”。

齐云社每年都会组织全国性的比赛——山岳正赛，相当于现在的超级联赛。那时候，凡有些身份的，都会带上妻子老小去看球。

除了齐云社，还有一些民间赛和表演赛。这些“足球”比赛，通常在头一年的冬至到第二年的春末夏初之间。如果你元宵期间到北宋开封府，会看见东京御街每日都有“击丸蹴鞠、踏索上竿”等文娱表演；元宵节后收灯，开封人又纷纷“出城探春”，此时郊外园圃举目秋千巧笑，到处是蹴球的红男绿女；暮春三四月，“宴殿南面有横街，牙道柳径，乃都人击毬之所”。皇家林苑琼林苑对市民开放，园内也有专供市民踢球的场地。

根据各类正史、笔记、野史记载和描述，北宋的开封、南宋的杭州，当时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足球之都。

宋话本《钱塘梦》形容杭州：“有三十六条花柳巷，七十二座管弦城，更有一答闲田地，不是栽花蹴气毬”。就是说，杭州但凡有块空地，不是栽花就是踢球。

两宋三百多年，“足球”运动长盛不衰，水平独步天下，上至皇家贵胄、达官显贵，下至贩夫走卒、黄口小儿，都以踢球为乐。从侧面来讲，“足球”生动反映了当时社会物质、精神的丰富和人民生活富足。

